

#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政策与栅栏区的起源\*

疏会玲

**内容提要** 栅栏区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犹太人在俄国西南边疆聚居的特定区域。它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移民政策、边疆政策和犹太人政策的综合产物。18世纪下半叶俄国三度参与瓜分波兰,大量波兰—立陶宛犹太人跟随殖民地进入俄国。在整合新殖民地的过程中,俄国政府推行了融合犹太人的宽容政策。由于地方政府和民众阻挠,1791年后俄国开始禁止犹太社团进入腹地,逐步将其限制在边疆省份,形成栅栏区。与此同时,俄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内政改革使得犹太人在传统职业、赋税、犹太教司法等领域遭遇一定的限制和歧视,在社会地位上更加边缘化。栅栏区的出现凸显了俄国少数民族与主体社会、边疆与腹地之间的隔阂与对立。19世纪后,随着地理和社会边界的强化,栅栏区进一步阻隔了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互通互融,致使晚期沙俄深陷“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困境。

**关键词** 沙皇俄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 犹太人政策 栅栏区

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sup>①</sup>是近代早期犹太人在沙皇俄国的聚居区,位于北及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北岸的俄国西南边疆,囊括今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拉脱维亚及俄罗斯西部等区域,面积最大时近110万平方公里,区内犹太人口最多时超过400万。<sup>②</sup>1835年,栅栏区被立法确立下来,成为俄国犹太区的代名词。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俄国颁布《废除宗教和民族限制法令》,宣布:“出于信仰、个人声明或民族归属而制定的对俄国公民权利的一切限制的现存法律应予废除”,<sup>③</sup>标志着犹太栅栏区被正式取缔。此后,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建立犹太自治州(Jewish Autonomous Oblast,1934年设立),作为另一种形式的犹太区延续至今。

在研究近现代俄国犹太民族政策,特别是考察沙俄晚期的“犹太人问题”(Jewish Question)<sup>④</sup>时,犹太栅栏区是绕不开的话题,受到犹太学界<sup>⑤</sup>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堪称丰富。尽管如此,关于犹太栅栏区起源的相关问题仍具有争议性。比如,许多学者认为栅栏区形成于叶卡捷琳娜二

\*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20C031)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犹太栅栏区”(The Pale of Jewish Settlement)的表述也十分常见,见 Cecil Roth (ed.),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15,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2007, p. 351.

② Robert E. Mitchell, *Human Geographies Within the Pale of Settle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3–14. 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栅栏区内犹太总人口超过487万,占栅栏区总人口的11.46%,见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6, p. 63.

③ John Efron, Matthias Lehmann and Steven Weitzman, *The Jews: A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289.

④ 18世纪至20世纪,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经济、法律等歧视,同时深受同化思潮、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影响。当时有许多欧洲学者和政治家主张,坚持单一性的犹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犹太人问题”一词最早在1750年前后出现,主要讨论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和宗教少数派在欧洲应该享有怎样的法律、民族和政治地位等。

⑤ 代表性学者有 S. M. 杜布诺夫、安东尼·波隆斯基、萨洛·巴龙、伊萨克·列维塔茨等。

世(Екатерин II Алексеевна, 1762—1796年在位,有译“凯瑟琳二世”)时期,并存在“1772年”“1791年”等不同说法。<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栅栏区起源于尼古拉一世(Nicolas I, 1825—1855年在位)时期,有1835年法令为证。在栅栏区出现的原因方面,犹太学者倾向于把栅栏区与反犹太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栅栏区是俄国反犹太政策的产物。有些学者则认为栅栏区延续了东欧犹太社团大聚居小散居的传统,本质上是原波兰—立陶宛犹太人聚集区在俄国的另类表现形式。<sup>②</sup>

作为人为构建的地理空间,栅栏区限制了犹太人的自由移动,开启了俄国在总体上边缘化犹太人的历史进程。栅栏区起源阶段,俄国对犹政策以宽容为主,其间所通过的涉犹立法、建立的相关制度奠定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俄国对犹政策基调。同时,这一时期俄国社会也存在政府与民众对犹态度不一、地方自治权过大、边疆政令不通等内政痼疾,栅栏区正是在沙俄中央政府向地方民众妥协退让的过程中形成的。俄国对犹政策的融合倾向与栅栏区的隔离属性在本质上自相矛盾,这使得“犹太人问题”在沙俄晚期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最终爆发反犹太主义浪潮。“犹太人问题”困扰俄国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考察栅栏区的起源有助于理解沙皇俄国的民族政策、“犹太人问题”,以及反犹太主义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俄国律法汇编集“PSZ”<sup>③</sup>收录的相关涉犹法令,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政策为主线,围绕促成栅栏区形成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梳理栅栏区的起源,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后续对犹太栅栏区及俄国“犹太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 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认知及其早期对犹政策

俄国犹太人从何而来?学界一般认为,俄国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犹太化国家——哈扎尔王国(Hazar)。<sup>④</sup>11世纪初,哈扎尔王国瓦解后大量犹太人向外流散,其中一部分进入基辅罗斯,是为俄国犹太人前身。也有观点认为,俄国犹太人是18世纪中后期东欧地缘政治变动的产物,本质上是波兰—立陶宛被瓜分后进入俄国统治区的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词源上来说,最早在12世纪,俄国开始用“zhid”(жид,意为“犹太人”)一词称呼犹太人,该词源于波兰语的“zhyd”,是拉丁语“Judaicus”的斯拉夫语形式。“zhid”在俄语中具有贬义。1676年,费奥多三世(Feodor III, 1676—1682年在位)在一份法律文书中称呼犹太人为“yevrei”(еврей,意为“希伯来人”)。<sup>⑤</sup>此后,更为中性的“yevrei”常被用来指称犹太人,但很多官方政策文件仍倾向于使用“zhid”一词。对犹太人而言,带有冒犯意味的“zhid”和内涵温和的“yevrei”都是外邦社会给予的绰号,犹太人通常延续传统自称“Bene Israel”(意为“以色列之子”)。另外,“俄国犹太人”(Russian Jews)是较晚近的说法,是在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政策广泛开展后才使用开来的。

<sup>①</sup>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Varda Books, 2001, p. 314; Salo W. Bar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10, no. 1, Mar., 1938, p. 51. 其中,“1772年说”认为1772年俄国首次通过瓜分波兰获得了大量犹太人口,这些犹太人所在的区域相对集中,且未出现大规模向外移民现象,活动空间也较固定,因而具有了栅栏区的初始形态和特征。持“1791年说”的学者指出,同年底俄国出台法律明令禁止犹太人进入腹地城市,仅允许其移居位于边境地带的新占领地区,这标志着俄国利用法律手段人为构建起了具有限制性色彩的栅栏区。

<sup>②</sup>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Revisiting the Origin of the Pale of Jewish Settlement and Its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91, 2019, p. 799.

<sup>③</sup> “PSZ”是俄国律法汇编,全称“Polnoe Sobranie Zakonov”(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于1830—1916年出版,收录了1649—1913年俄国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

<sup>④</sup> 有学者认为,俄国犹太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见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

<sup>⑤</sup> John D. Klier, “‘Zhid’: Biography of a Russian Epithet”,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 2.

大流散时期外邦社会对犹太人的认知普遍具有“他者化”的倾向,犹太学者对此有这样的概括:在本地人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受剥削者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sup>①</sup>叶卡捷琳娜二世针对犹太人的公开表述不多,但同样有着贬低、异化犹太人的倾向。在她看来,犹太人寡廉鲜耻,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比大部分人都贪婪。<sup>②</sup>其在位时期,莫吉廖夫(Mogilev)和波洛茨克(Polotsk)两地总督——卡克霍夫斯基(M. V. Kakhovsky)与克里奇尼科夫(M. N. Krechetnikov)也都表达过类似观点,认为犹太人不诚实,剥削底层民众。<sup>③</sup>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认知常常将犹太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行为与犹太民族的整体品性混为一谈。

作为传统的东正教国家,俄国社会的犹太人认知带有很强的宗教主导性。早在莫斯科公国时期,犹太人作为“异教徒”常被视为“危险的魔术师”“引诱基督教徒成为犹太化异端”。“这些偏见是深受鞑靼-拜占庭文化传统影响的俄国人普遍不喜欢外国人或‘异教徒’态度的一部分。”<sup>④</sup>彼得大帝上台后为将俄国建成欧亚强国而广揽人才,<sup>⑤</sup>当时有声音呼吁俄国应吸收和接纳犹太商业精英,<sup>⑥</sup>但他却回应称“我宁可看到我们整个国家都改宗伊斯兰教,或者其他什么异教,也轮不上犹太人来指手画脚,他们就是一帮流氓、无赖和骗子,我的职责不是让邪恶加倍,而是根除一切恶行……”<sup>⑦</sup>以宗教对立为主导的犹太人认知其根源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神学纷争,后演变为对犹太人群体的贬低和抨击,甚至夹杂着“恐犹症”(Judeophobia)的心理因素。

俄国社会对犹太人形成的宗教偏见具有历史延续性,很难从俄国统治阶层对犹太人的认知中剥离,叶卡捷琳娜二世也不例外,其早期对犹太人的态度和政策堪称对前任沙皇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741—1761年在位)的直接继承。作为东正教信仰的坚定拥护者,伊丽莎白一世以“基督的敌人”定义犹太人,曾以“不想从基督的敌人那里获益”<sup>⑧</sup>为由,断然拒绝犹太人进入小俄罗斯(Malorossiya,下文简称小俄)经商,并于1742年下令:“所有犹太人,除非愿意改宗基督教,否则,无论男女,无论职业,须立即携带所有财产离开俄国……”<sup>⑨</sup>此后,犹太社团持续请愿要求撤销驱逐令。为了表达对前朝政策的坚守,加上东正教会和贵族施压,上台之初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推迟了对请愿书的讨论,还于1762年12月4日颁布了一份简短的法令,允许并邀请外国人到俄国旅行和定居,但不包括犹太人。<sup>⑩</sup>法令标题甚至直接使用了“犹太人除外”(krome

① Max Weinreich, *Hitler's Professors: 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y'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

②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The Origins of the Pale of Settlement",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 vol. 5, no. 2, 1975, p. 4.

③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2010, p. 333.

④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243.

⑤ Paul W. Werth, *The Tsar's Foreign Faiths: Toleration and the Fate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Imperial Rus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8 - 39.

⑥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9.

⑦ Isaac Levitats,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Russia, 1772 - 18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 20 - 21.

⑧ 这句话由伊丽莎白一世写在文书页边,旨在反驳乌克兰长老让犹太人进入小俄罗斯经商的请求,见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5.

⑨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1. 小俄罗斯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4世纪初的拜占庭帝国,指代俄罗斯西部的宗教辖区。18—19世纪,俄国西南边疆经常被笼统地称为小俄罗斯。根据英国地图学家伊曼纽尔·博文(Emanuel Bowen)所著《地理全舆图》(*A Complete System of Geography*, 1747年出版)中的历史地图显示,沃罗涅什(Voronezh)和坦波夫(Tambov)之间的区域被标注成“小俄”。1764年,俄国开始设置小俄罗斯行省。

⑩ PSZ, no. 11720.

zhidov) 的表述。

从国际维度看,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在塑造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认知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8世纪正值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盛期,哲学家、文学家、法学家不断涌现,当中不乏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持批评和反对态度者,伏尔泰即其中之一。阿瑟·赫茨伯格(Arthur Hertzberg)认为伏尔泰是明显的反犹主义者,其反犹思想介于宗教化仇恨犹太人与现代反犹主义之间,那些仇恨犹太人的学者常常被他的言论吸引。<sup>①</sup> 号称“无论在什么场合口袋里总会揣本书”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启蒙思想十分着迷,并长期与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保持通信。因此,其形成的犹太人认知与伏尔泰如出一辙,即犹太人是迷信之徒,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带有鲜明的反启蒙主义特征。<sup>②</sup>

不过,作为执政者,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治国理念当中对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的追求超越了其个人化的对犹认知。尽管将犹太人摆在东正教与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她仍十分赞赏犹太人所具有的商业才能,并希望加以利用。按照约翰·克莱尔的说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对俄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来源并不关心,她欢迎非基督徒、非斯拉夫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经济追求。<sup>③</sup> 权力巩固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政策不再囿于其对犹认知,也不再完全受制于教会和贵族,开始转向理性的实用主义。根据PSZ第16卷至第23卷的收录,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共发布过660多条敕令,相关法律文本当中反复出现“怜悯”(miloserdie)、“慈善”(chelovekoliubie)等字眼,<sup>④</sup>传达着这位女皇宽容仁慈的施政理念,这在其对犹政策当中同样有所体现。

在1763—1764年间,叶卡捷琳娜二世与犹太商人多次谋划并达成口头协议,以不公开的方式“偷偷”为一些犹太移民打开了沙俄的大门。<sup>⑤</sup> 最早向犹太人开放的区域是新俄罗斯(Novorossiya,下文简称新俄<sup>⑥</sup>)。新俄曾在较长时间内被划为军事战备区,在俄土停战并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后,当地人口回流或迁往其他城市,发展不足问题比较突出。为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向包括移民和战俘在内的犹太人开放了新俄定居权。<sup>⑦</sup> 从1764年开始,此前定居俄国和新近到达的犹太人被陆续安置在新俄。<sup>⑧</sup> 1769年11月16日,一条涉及多国籍犯人的法令也要求将俄土战争期间被关押在摩尔多瓦(Moldavia)和瓦拉吉亚(Wallachia)的犹太人安置到新俄。<sup>⑨</sup>

为进一步吸引和鼓励犹太人移民边疆,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默许他们移居以里加为代表的其他未开放定居权的地区。里加(Riga)是北部移民南迁的必经省份。1764年5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向里加官员发送密文,要求后者允许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新移民途经或暂居里加。随后,驻守波兰—立陶宛的军官达什科夫(Prince Dashkov)对外申明:“将为前往或途经里加的人员颁发护照,并保护迁居新俄的移民。”一些犹太人在南迁过程中停留在里加,并前往斯摩棱斯克(Smolensk)、首都圣彼得

① Harvey Chisick, “Ethics and History in Voltaire’s Attitudes toward the Jew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35, no. 4, 2002, p. 577.

②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4.

③ John D. Klier, “The Ambiguous Legal Status of Russian Jewry in the Reign of Catherine II”, *Slavic Review*, vol. 35, no. 3, 1976, p. 510.

④ John P. LeDonne, *Ruling Russia: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Age of Absolutism, 1762 – 179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5.

⑤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6.

⑥ 新俄位于黑海与克里米亚半岛北部区域(大致位于今乌克兰中南部),原属奥斯曼土耳其领土,伊丽莎白一世在18世纪30年代将其侵吞。1764年,新俄被划为省份。

⑦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3.

⑧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85.

⑨ PSZ, no. 13383.

堡等城市,甚至最终定居下来,当地政府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未追究,在1773年与法国哲学家狄德罗通信时,她主动提到有不少犹太人住在圣彼得堡,这一点她和当地民众都心知肚明。<sup>①</sup>当然,这类默许并非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独有。早在17世纪,莫斯科等城市就已存在规模不等的外国区,在政府默许下,区域内活跃着大量来自北欧和西欧的商人、技术工人、政府顾问等非俄国臣民。<sup>②</sup>

总体而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认知带有先入为主的宗教偏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1772年后,犹太人成为俄国直接统辖对象,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犹太人政策迎来调整,从以吸引安置外来犹太移民为主转变为以整合内部犹太臣民为主,开发犹太臣民的“有用性”、发挥犹太臣民的社会价值等理念逐渐占据主导。基于这些理念,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俄国社会在集体想象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犹太人形象,即犹太人可以作为一个毫无特色的实体发挥作用:壮大城市阶层队伍,推动经济变革,抑或为农业人口的苦难承担集体罪责”<sup>③</sup>。

## 二、从融合到分离:栅栏区的形成

领土瓜分和人口接管在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犹太人与俄国之间可有可无的薄弱联系,确立了犹太人与沙皇俄国在政治上的臣属关系。18世纪中后期东欧地缘政治剧烈变动,俄国通过对外征伐推动疆域大幅西扩,尤其是瓜分波兰给俄国带来了大量土地和人口。1771—1772年俄国与普鲁士、奥地利联手第一次瓜分波兰,获得了被称为“白俄罗斯”(Byelorussia,下文简称白俄)的新领土,面积约9.3万平方公里。1793年和1795年再度参与瓜分波兰后,俄国分别获得了约25万平方公里和约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此,570多万人口随新殖民地归入俄国,其中包括约90万“新犹太人”。<sup>④</sup>俄国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sup>⑤</sup>

同时,独特的民族和宗教属性使得犹太人与东正教俄国之间形成复杂的族际关系和宗教关系。诸多民族融合的历史经验昭示,推动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融入主流社会是一项繁难的工程。而如何从经济、宗教、社会结构等方面来规范犹太人,俄国法律当中没有先例。在此背景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启了对犹融合政策(amalgamation)<sup>⑥</sup>的最早尝试。

应当为俄国树立怎样的民族政策典范?叶卡捷琳娜二世并没有清晰规划,她“对待东欧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政策变化很大……总体而言,基本趋势是融合和同化它们的精英阶层,漠视它们的地方特性”<sup>⑦</sup>。1772年后进入俄国的主要是原波兰—立陶宛犹太人,他们延续中世纪传统以卡哈尔(kahal)<sup>⑧</sup>的方式组织社团生活。卡哈尔形同独立的市政委员会,对社团成员拥有管辖权,也有权管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往来。<sup>⑨</sup>毫无疑问,“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保持犹

①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87.

②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82.

③ John D. Klier, "The Ambiguous Legal Status of Russian Jewry in the Reign of Catherine II", p. 507.

④ Martin Gilbert, *Jewish History Atla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6, p. 70.

⑤ Artur Eisenbach,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in Poland, 1780 - 187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The Institute for Polish-Jewish Studies, 1991, p. 113.

⑥ 俄国针对犹太人的融合政策在19世纪更加鲜明,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以及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被视为“融合政策推动者”(amalgamator),见 Steven M. Lowenstein, "Governmental Jewish Policie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6, no. 3/4, 1984, p. 314.

⑦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⑧ 卡哈尔(qahal)是犹太社团自治机构,在犹太大流散时期广泛存在于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及基督教欧洲。16世纪后东欧犹太人多以卡哈尔的方式组织社团,通过选举产生多位成员,负责管理税收、商业、卫生、教育、慈善等社团事务。

⑨ John P. LeDonne, *Ruling Russia*, p. 25.

太社团的完整性对俄国政府是有益的”<sup>①</sup>。叶卡捷琳娜二世顺势而为,保留了前波兰-立陶宛犹太社团所在区域的相关建制,并于1776年正式认可并赋权卡哈尔,允许其管理社团内部事务,为帝国代收税赋,并履行一定的司法职能。<sup>②</sup>

作为沙俄晚期针对犹太人推行融合政策的最早实践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保持犹太社团现状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犹太新臣民融入俄罗斯社会体系。1772年8月16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当地首位总督扎卡·切尔尼谢夫(Zakhar Chernyshev)发布了一份公告(Plakat),向新殖民地民众承诺:“所有原波兰居民,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是俄国臣民,继续享有此前在波兰所拥有的宗教自由、个人权利以及与财产相对应的特权。”<sup>③</sup>公告特别提道:

根据上述对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不可侵犯的庄严保证,居住在现已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城市和领土上的犹太社团也将根据【俄罗斯】法律和【他们自己的】财产享有此前所拥有的权利和自由。只要犹太人作为忠实的臣民服从统治,并且根据自己的职业去从事真正的贸易和商业,女王陛下的仁慈就不允许她单独将犹太人排除在……外。<sup>④</sup>

这份公告对犹太社团意义重大,意味着政府公开认定犹太人是合法的、享有各类权益的俄国臣民。不仅如此,公告在提到犹太社团时使用的是“yevrei”,而非常见的“zhid”,意在强调政府将犹太社团视为俄国的一分子,是普通的宗教少数派而非地位特殊的“国中之国”(nation-caste)。<sup>⑤</sup>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颇有微词的杜布诺夫也承认,该称呼的使用是其在位时期针对犹太人的一项有意义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公告发挥着基本法的作用,为随后众多涉犹宽容法令的出台奠定了政策基调和法律基础。177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泛化了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宽容政策,诸如:允许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Tatars)和巴什基尔人(Bashkirs)组建穆斯林社团;赋予1772年后进入俄国的犹太社团以合法地位;允许非东正教信徒向新俄、白俄等俄国边疆区移民。

为推动犹太人脱离犹太教,改宗融入东正教社会体系,1776年10月17日,俄国颁布法令进一步规定,改宗东正教的犹太人可享有更多权利,不仅免交人头税,还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和定居地。<sup>⑥</sup>1779年,为减轻犹太社团税负,政府将犹太人人头税从此前的1卢布减半为50戈比。<sup>⑦</sup>1786年5月7日政府又颁布了《关于保护犹太人在俄国法律责任、贸易和工业方面权利的诏令》<sup>⑧</sup>,这部常被称作“1786年宪章”的法令强调:“犹太人与其他人社会地位平等,并可享有与财富和地位相称的权利,而无关出身和宗教。”<sup>⑨</sup>遗憾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抵制,该法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尽管如此,由于其正式宣布了犹太人享有完全财产权且歧视他们宗教和出身的行为违法,而被许多学者视为近现代俄国犹太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因此被誉为首位试图平等对待犹太人的

①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01.

②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09.

③ PSZ, no. 13850.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5.

④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07.

⑤ John D. Klier, “‘Zhid’: Biography of a Russian Epithet”, p. 3.

⑥ PSZ, no. 13865.

⑦ PSZ, no. 14892; John P. LeDonne, *Ruling Russia*, p. 322. 在18世纪俄国,卢布(Рубль)是本位货币单位,戈比(Копейка)是辅币,1卢布等值100戈比。

⑧ PSZ, no. 16391.

⑨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1881*, p. 334.

欧洲君主。<sup>①</sup>

17—18世纪启蒙与解放运动在欧洲兴起,传统保守的犹太社会也被卷入了现代性的洪流当中。伊萨克·列维松(Isaac Baer Levinsohn)在《学在以色列》(Te'udah be-Yisrael)中发出的时代之问——犹太人应当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教文化,还是外邦社会的语言和世俗科学?<sup>②</sup>——是当时犹太社会在启蒙和解放面前彷徨无措的写照。面对坚守自我还是融入外邦的两难,犹太社会分化出同化派与反对同化派,前者提倡拥抱现代性和世俗化,融入主流社会,并发展出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Haskalah)<sup>③</sup>;后者则呼吁坚守犹太教传统和犹太人的身份属性。随着哈斯卡拉运动的勃兴,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宽容政策的吸引,犹太社会同化派势力不断增长,不少犹太人呼吁按照政府意愿彻底改革犹太社团结构,<sup>④</sup>以更好地融入俄国。当白俄在1783—1785年举行市政选举时,犹太人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白俄是犹太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据统计,1783年白俄城市人口中58.6%是犹太人。<sup>⑤</sup>经过选举,莫吉廖夫和波洛茨克共23个城市最终产生了8位犹太市长:莫吉廖夫7位,波洛茨克1位。<sup>⑥</sup>尽管存在配额不合理、选举歧视等问题,但在此之前,只有托斯卡纳大公国(Tuscany)允许犹太人参与市政选举,<sup>⑦</sup>因此,俄国赋予犹太人选举权仍堪称欧洲先例。

通过给予犹太臣民社团自治、宗教自由、市政选举等诸多基本权利,同时以税收减免、自由定居等权利吸引犹太人改宗东正教,俄国政府在政治、财税、宗教以及社会福利等领域实践着对犹融合政策。然而,该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犹太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显著差异,在协调地方政府、普通民众与犹太人的关系上也不成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犹政策相抵牾的情况不时出现,那些因大量犹太人的到来而利益受损的商人群体更是怨声载道。早在177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表露了对犹太人人口规模过大的担忧,称“白俄到处是犹太人。若大量犹太商人进入俄国社会内部,势必将对中下层商业群体造成冲击”<sup>⑧</sup>。对犹太人的到来深感不安的还有俄国商人阶层。1790年2月15日,莫斯科商会派出6位代表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驱逐犹太人,他们指出早在1727年和1762年政府已明令禁止犹太人进入俄国内陆,但仍有不少犹太商人罔顾法律进入莫斯科,参与走私活动。<sup>⑨</sup>显然,此前政府的默许助长了犹太人非法移居腹地的风气,而犹太人涉嫌走私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sup>⑩</sup>但莫斯科商人之所以抗议,究其根源还是在于犹太群体特殊的经济结构——犹太人多为商人和手工业者,<sup>⑪</sup>与同行业的俄国人形成竞争关系。由此,犹太人的社会融合受到了由自我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督教人口的敌意和无法容忍犹太人享有社会平等的群体的阻挠。<sup>⑫</sup>

①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p. 4, 13.

②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p. 124 - 125.

③ 哈斯卡拉(Haskalah,有“智慧”“博学”之意)是倡导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等理念的犹太启蒙运动,主张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复兴希伯来语等。18世纪70年代哈斯卡拉在东欧地区出现,到19世纪80年代犹太民族主义兴起后结束。

④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33.

⑤ 具体而言,犹太人在莫吉廖夫总督区占比为67%,并在该区12个城市中均占多数;在波洛茨克犹太人占比为47%,该区11个城市中有7个是犹太人口占多数。

⑥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1.

⑦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6.

⑧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88.

⑨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93.

⑩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15.

⑪ 根据19世纪的统计数据,俄国犹太人当中只有1%从事农业,约75%的人口从事贸易、手工业、中介等行业,见 Cecil Roth (ed.),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17, p. 532.

⑫ John D. Klier, "The Ambiguous Legal Status of Russian Jewry in the Reign of Catherine II", p. 509.

进一步说,莫斯科商人的抗议也暴露了俄国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腹地与边疆之间的对立关系。对俄国人而言,犹太人只是西部边陲上一支“地处偏远、有时又是无足轻重的外来人口”,<sup>①</sup>不应跨越边界进入俄国主体部分。1790年2月19日上任的莫斯科新总督亚历山大·普罗佐洛夫斯基(Alexander Prozorovsky)正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作为一个严守纪律的职业军人,他不信任任何外来的人员和事物,对犹太人进入莫斯科尤其感到不快。<sup>②</sup> 适逢商人抗议,他随即下令驱逐城内犹太人。犹太社团对此大为不满,并于1790年9月针对驱逐令发起请愿,但得到的结果是更大范围的驱逐。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1年12月23日下令:

犹太人不得加入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城市社团,但可以定居在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的新殖民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和塔夫利达(Tavrida,即克里米亚)。<sup>③</sup>

从这份简短的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叶卡捷琳娜二世试图以折中的方式回应俄国民众与犹太人。一方面,禁止犹太人进入腹地,以平息抗议和安抚俄国商人;另一方面,为了“补偿”犹太人,允许他们定居新殖民地,同时寄望一举两得,推动边疆地区长远发展。这是当时俄国政经界的共识,时任商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沃龙佐夫(Aleksandr R. Vorontsov)就曾坦言:鉴于边疆省份需要新移民开发,犹太人定居边疆比定居俄国心脏地带更有价值。<sup>④</sup>

1791年法令是俄国政府首次通过立法明确拒绝犹太人进入腹地城市,如很多学者所认同的,它开创了排斥和隔离犹太人的先河,标志着栅栏区的兴起,也标志着犹太人与主体社会之间从融合走向了分离。此后,犹太人的定居地被逐步限制在西南边疆。1794年6月23日,政府再度颁布法令,确认了向犹太人开放的定居地:1. 两个白俄总督区——莫吉廖夫和波洛茨克;2. 新俄总督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克里米亚;3. 前波兰省份——波多利耶(Podole)、沃伦(Volhynia)、明斯克(Minsk);4. 前乌克兰省份——基辅(Kiev)、切尔尼戈夫(Chernigov)、波尔塔瓦(Poltava);5. 诺夫哥罗德-谢维斯基(Novgorod-Seversky)。<sup>⑤</sup> 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后,两个前立陶宛省份——维尔诺(Vilno)和斯洛尼姆(Slonim)也被划为犹太定居地。<sup>⑥</sup> 至此,犹太栅栏区在18世纪的地理范围基本划定。<sup>⑦</sup>

总体上,栅栏区地理边界的形成与俄国瓜分波兰的历史进程相当,其地理范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前呈逐渐扩大之势。此后开始萎缩,并于1805—1835年间收缩到仅包括立陶宛诸省、白俄(不含农村)、小俄(不含农村)、切尔尼戈夫、新俄(不包括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波尔、雅尔塔)、基辅省(不包括基辅市)。不仅如此,西部边境线50俄里(versts,约53公里)以内的农村也禁止犹太人定居。尼古拉一世在1835年立法确立栅栏区后,其地理边界变得更加难以跨越,而那些法律未规定的区域都成了犹太人不可进入的禁区,用奥尔尚斯基(Orshanskii)的话说,司法的普遍精神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涉及犹太人时俄国政策恰恰相反,变成“法无授权即禁止”。<sup>⑧</sup>

① John Efron, Matthias Lehmann and Steven Weitzman, *The Jews: A History*, p. 285.

②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6.

③ PSZ, no. 17006;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36.

④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803.

⑤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36.

⑥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8.

⑦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17.

⑧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802.



### 三、内政改革与栅栏区的社会边界

如果说瓜分波兰和整合边疆殖民地推动了栅栏区地理边界的形成,那么,内政改革则由于加剧了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隔阂使得栅栏区具有了隐形的社会边界。正如犹太史学家所说:“将犹太人与基督徒隔开的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上的距离和司法上的差异……犹太人生活在城镇,却不属于城镇。”<sup>①</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是沙皇俄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不断涌现的新贵族<sup>②</sup>对特权、地位有更多的伸张和诉求。与此同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改革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在1775—1785年间,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展了一系列涉及市政、财税、司法等领域的内政改革,试图通过规范主要社会阶层(贵族、市民、农民及神职人员等)的边界来重塑帝国内部秩序。<sup>③</sup>大部分内政改革不具有犹太人指向性,但却将犹太人裹挟其中,对犹太社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影响犹太人的诸多改革当中,首先是注册制改革,它推动犹太社团与城镇形成依附关系,阻断了犹太人自由迁居的道路。1775年3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展了行省改革,<sup>④</sup>后在此基础上要求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非农人口按财产规模划分等级,注册组成城市社团。拥有500卢布及以上财产者属于商人阶层,并且:财产超过10000卢布归为第一层级;1000—10000卢布属于第二层级;第三层级是500—1000卢布。商人之外的人员(财产小于500卢布)即为普通市民。<sup>⑤</sup>商人阶层内部有着规模不等的商会,组成商人共同体,并设置了行业许可制度、商会准入制度等。1778年末至1779年初,白俄犹太人率先申请加入所在地商会。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0年1月7日予以批准,并要求犹太人完成相应的纳税任务。<sup>⑥</sup>到1784年,仅莫吉廖夫就约有10%的犹太人注册为商人,其余大部分注册为市民。<sup>⑦</sup>然而,不同城市之间的商人共同体相互独立,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犹太社团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加上1780年1月7日法令遗留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对犹太人如何加入白俄以外地区商会做出规定,犹太人向外移居变得几无可能。

从犹太社团内部看,注册制度加剧了犹太社团的分化,卡哈尔自治体系走向瓦解。在融合政策给予的诸多福利吸引下,许多犹太人注册加入商会并逐步脱离卡哈尔。卡哈尔流失了最富有的社团成员,财政上难以为继,甚至无法再伸张向社团征收集体税的权力。<sup>⑧</sup>与此同时,社团内部的拉比派和哈西德派(Hasidim)<sup>⑨</sup>争斗不断,社团成员加速分化,社团领袖逐渐失去了传统的权威。因成员锐减、主权消散,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末期,一些小规模卡哈尔已近分崩离析。由此可以认为,卡哈尔在1844年12月被尼古拉一世正式废除似乎是其可预见的“归宿”。

其次,政府收缩农村定居权和酒水销售权,制造了犹太人无法触及的地域和职业空间。1782年7月2日,政府颁令要求奥洛涅茨克(Olonetsk)省的商人和市民不得定居农村。<sup>⑩</sup>半年后,这项

① John Efron, Matthias Lehmann and Steven Weitzman, *The Jews: A History*, p. 241.

② 据学者统计,仅1744—1762年俄国贵族群体就增长了33%,从3.7万多名男性增加到近5万人,见John P. LeDonne, *Ruling Russia*, p. 21.

③ John P. LeDonne, *Ruling Russia*, p. 21.

④ 1775年和1780年,俄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行省法令》(*Decree on the Governorates*)及其第二部分,开启了行省改革。

⑤ PSZ, no. 14275;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31.

⑥ PSZ, no. 14962.

⑦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89.

⑧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32.

⑨ 哈西德派(Hasidim,“哈西德”原意为“虔诚”)是犹太教派别之一,由以色列·本·埃利泽尔(Israel Ben Eliezer)创立。哈西德派于18世纪在东欧兴起,信奉哈西德主义(Hasidism),以坚守阿什肯纳兹犹太传统和宗教保守主义闻名。

⑩ PSZ, no. 15459.

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整个俄国。尽管在注册制度下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归属于城市社团,但实际上,许多犹太人为逃避城镇的复杂局势而选择定居农村,<sup>①</sup>并从事酒精酿造、销售等商业活动。1783年5月3日,白俄新总督帕谢克(P. G. Passek)下令,禁止辖区内的犹太人从事酒精的酿造和售卖,并禁止地主将酿酒厂和酒馆租给犹太人。同时,他下令将注册为商人而实际定居农村的犹太人赶到城市。<sup>②</sup>

上述法令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地主利益和土地资产,同时也为了杜绝普通臣民以非农身份定居农村,并保证涉酒行业只能由市政或贵族从事。但对犹太人而言结果是灾难性的:酒水生产和销售是犹太人的传统职业,这类职业失去了合法性意味着生存面临危机;而对一些世代生活在农村的犹太家庭来说,被赶出农村几乎等同于被“连根拔起”。迫于困境,犹太社团于1784年底发动请愿。<sup>③</sup>1785年11月,莫吉廖夫和波洛茨克两地的犹太社团派出由商人拉夫卡·法比什维奇(Lavka Faybishovich)领衔的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交涉,提交了来自不同社团的18份请愿书,归结起来,其中几点是要求政府:暂停禁止卖酒令;撤销禁止地主向犹太人出租酒厂和酒馆的命令;允许犹太人自由定居农村。<sup>④</sup>议会讨论请愿书后,叶卡捷琳娜二世重申了犹太人与其他臣民地位和权利平等,并因此出台了前文所述的“1786年宪章”。但地方政府背离了这一宽容政策。帕谢克没有遵从议会,反而对犹太人的诉求进行了逐一驳回,他称,禁止犹太人卖酒是由于1772年9月13日政府已将白俄酒精零售权收归市政,<sup>⑤</sup>而禁止注册为城市社团的犹太人定居农村则是在践行1782—1783年的相关法令。<sup>⑥</sup>

再次,向犹太人开征双倍税构成了对犹太人的财税歧视,强化了犹太人的“他者”身份和地位。1794年6月23日,被历史学家视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第一条歧视犹太人的法令出台,由两部分组成:其一,允许犹太人在特定省份和区域加入商会;其二,所有加入商会的犹太人,必须缴纳比同等财产的基督徒多1倍的税,也即犹太商人需将财产的2%上税,普通犹太市民需交2卢布人头税。<sup>⑦</sup>同时,不愿服兵役的犹太人仍需缴纳特殊税来换取豁免权。<sup>⑧</sup>该法令适用于俄国全境犹太人,唯一例外的是克里米亚的卡拉派犹太社团(Karaites),他们与基督徒同权,无须缴纳双倍税,且可拥有不动产。<sup>⑨</sup>

为何向犹太人征收双倍税?原因首先与财政有关。事实上,18世纪末俄国财政状况不佳,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赤字严重。<sup>⑩</sup>叶卡捷琳娜二世向犹太人征收双倍税明显具有缓解经济压力的意图。问题在于,以财产规模或收入水平为标准实行差别化税制是常见的税收政策,无可厚非,但以“是否为犹太人”作为依据则带有了一定的歧视意味。不仅如此,上述法令还要求不接受新税制的犹太人离开俄国,且必须提前支付3年的双倍税作为罚金。<sup>⑪</sup>原本出于财

① Cecil Roth (ed.),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17, p. 532.

②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0.

③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11.

④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2;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p. 333 – 334.

⑤ PSZ, no. 13865.

⑥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7.

⑦ John P. LeDonne, *Ruling Russia*, pp. 264, 336.

⑧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 335.

⑨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18. 卡拉派(Karaites)是犹太教派别之一,发端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与拉比犹太教不同,卡拉派只承认书面《托拉》是犹太教神学的最高权威,不认可《塔木德》等口传《托拉》。10—12世纪是卡拉派发展的黄金时代,后逐步衰落。

⑩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8.

⑪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18.

政目的征收的双倍税由此变成了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惩罚性税收”(punitive tax)。另外,虽然卡拉派无须缴纳双倍税,但1795年6月8日的一条法令又特别强调,“拉比派犹太教徒不得进入卡拉派犹太社团”,以免前者以此方式逃税。有学者认为,这条法律更加确定了向犹太人征收双倍税也具有明确的宗教动机。<sup>①</sup>

最后,俄国政府剥蚀了犹太法庭的司法权力,使得犹太人面临司法障碍。为调和犹太教法与世俗法律之间的关系,生活在外邦社会的犹太人在大流散时期达成了“王国之法是为法”(law of the kingdom is law)的共识,尊重并认可定居国的法律体系。但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公共法庭,从属于卡哈尔的犹太法庭更适用于犹太社团,它背后是由数个世纪的经验、完善的法理、律法条文、评论以及拉比问答集共同构成的犹太律法体系。<sup>②</sup>在推行司法一体化的过程中,俄国政府要求犹太人通过市政公共法庭解决纠纷,一些地方政府逐渐不再认可犹太法庭。犹太人被迫使用公共法庭,但基督教法官通常并不了解《塔木德》(Talmud,拉比在犹太法庭做出判决的主要依据),也难以同说意第绪语(Yiddish,俄国犹太人的日常语言)的犹太诉讼人沟通。更糟糕的是,由于信仰差异,犹太人无法像基督徒一样在庭审前向上帝起誓。难以完成的诉讼程序形成了一道司法屏障,阻碍着犹太人通过公共法庭维护权利和伸张正义。

加上选举制度不完善,犹太人没有途径进入基督教司法体系担任法官或从事相关司法工作。对此,有犹太人抱怨道:假如依靠现行选举制度,犹太社团成员不可能被选为法官,也不可能拥有与基督徒同等比例的市政官和议员,那么,就没有官员可以处理犹太人的案子,涉案犹太人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裁决。<sup>③</sup>因此,前述犹太社团在1785年请愿时所提出的另外几点诉求即针对法庭,要求白俄市政立法确保犹太人和基督徒享有同等投票权;犹太人在市政法庭中应有法庭代理,且应恢复卡哈尔的行政、司法等权力。<sup>④</sup>这些诉求同样遭到了帕谢克的反驳,他不仅毫不避讳地承认在市政选举中歧视犹太人,还认为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受市政管辖,因此没有必要为其保留特殊法庭。<sup>⑤</sup>1795年,政府立法规定犹太自治机构只能管理社团内部的“宗教和神圣事务”,正式剥夺了卡哈尔的司法职能。<sup>⑥</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在《圣谕》(Nakaz,1767年编)中自问自答:“君主制的真正目标是什么?这并不是要剥夺民众的天生自由,而是要纠正他们的行为以获取最大的好处……”<sup>⑦</sup>这种理念具化到犹太群体身上,就表现为“让犹太人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无论是普遍化改革还是针对犹太人的个别政策,都没有脱离这一务实的框架。然而,意图与实践之间存在鸿沟。<sup>⑧</sup>很多涉犹法律大略清晰,细节模糊,这给地方政府留下了自由解读的空间,而远离首都和中央政府的俄国地方行政人员对法律的解释往往是任性的。<sup>⑨</sup>尤其是地方政府常与中央背道而驰,导致许多政策被歪曲、无法实施抑或实施的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这使得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自身命运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

①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 318.

②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05.

③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1.

④ Antony Polonsky, *The Jews in Poland and Russia, 1350 - 1881*, pp. 333 - 334.

⑤ Richard Pipes, “Catherine II and the Jews”, p. 12.

⑥ S. M. Dubnow,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vol. 1, pp. 319 - 320.

⑦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俄罗斯史》,第73、247页。

⑧ Salo W. Baron,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p. 16.

⑨ John D. Klier, “The Ambiguous Legal Status of Russian Jewry in the Reign of Catherine II”, pp. 504, 517.

#### 四、结 语

18 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成为俄罗斯帝国多元民族、宗教和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予了犹太人作为俄国臣民的合法身份和法律上的平等,并推行宽容政策,试图推动犹太群体融入俄国社会。但融合政策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反而导致了栅栏区的兴起。从 1791 年开始,俄国通过立法限制犹太人进入腹地,同时允许其定居西南边疆,使得犹太人在形式上被政府“驱赶”进了栅栏区。总结来说,栅栏区之所以出现,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其一,因波兰被瓜分而进入俄国的犹太人其世居地即位于西部边境,尤其是在白俄,犹太社团非常集中,这给叶卡捷琳娜二世顺势而为划定栅栏区的地理边界创造了客观条件。其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边疆政策和犹太人政策服务于“构建俄罗斯大帝国、维护俄罗斯有序边界”的政治目标,比起刻意排挤和打压犹太人,开发犹太人的“有用性”——填补边疆人口、激发边疆经济活力等——更符合俄国利益,换言之,栅栏区有其作为国家边疆区的特殊价值。其三,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晚期对犹政策发生了转向,融合政策未能一以贯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和俄国民众的背离和反对所致,将犹太人逐出腹地,限制其定居地、职业、法律权利等,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诉求。从这个角度看,栅栏区的起源过程也是俄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当权者与民众之间博弈的过程。

犹太学者历来热衷于建构栅栏区的起源与反犹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他们往往轻于肯定叶卡捷琳娜二世对犹政策宽容开明的一面,而重于指责栅栏区对犹太人自由移居权的扼杀。但考察俄国史可以发现,早在 17 世纪中叶,俄国法律就有一种趋势,即不鼓励任何城市居民的自由流动。<sup>①</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除了贵族通过 1785 年《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获得自由移居的特权外,俄国臣民没有普遍的自由定居权。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如法律规定:生活在伏尔加地区的鞑靼人不得拥有位于土耳其的土地;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和亚美尼亚人不得在波兰和外高加索地区担任公职。<sup>②</sup> 此外,由于疆域辽阔,尾大不掉,俄国法律的作用在一些省份比较薄弱,犹太人定居腹地的现象并没有因为栅栏区的出现而消失,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得到临时豁免的少数商人、犹太士兵以及高级手艺人等不断跨越边界,形成了犹太人向栅栏区外迁移的“涓涓细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栅栏区的存在与犹太人被边缘化的事实滋生并助长了晚期沙皇俄国的反犹倾向。19 世纪后,随着栅栏区地理和社会边界的不断强化,犹太人与主流社会互动减少、隔阂加深。犹太社团作为一个整体变成需要俄国严肃对待的“问题”,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保守政策策划者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甚至认为,在俄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犹太人中的 1/3 迁出,1/3 改宗基督教,1/3 湮灭。<sup>③</sup> 与此同时,反犹事件日益频繁。尼古拉一世不仅废除了卡哈尔制度,还鼓动通过军事手段迫使犹太人改宗东正教;亚历山大三世推行了以《五月法令》(May Laws)为代表的反犹政策,试图逆转犹太人融入俄国社会的进程;犹太社团则经历了敖德萨屠杀、基什涅夫屠杀等集体迫害(Pogrom)的晦暗历史;《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炮制和传播更是将俄国本土与欧洲的反犹思潮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因此,尽管栅栏区起源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但真正将栅栏区变成阻断少数民族与主体社会互通互融的“高墙”,变成犹太“隔都”(Ghetto),进而变成反犹主义的“温床”,这样的责任更多地应该由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俄国政府承担。沙皇俄国覆灭后,反犹主义并未退出俄国历史舞台:苏联时期受意识形态和特殊政治气候影响,反犹运动多次出现;即使在当代,由于大俄罗斯民族主

① John D. Klier, “The Ambiguous Legal Status of Russian Jewry in the Reign of Catherine II”, p. 513.

② Robert Geraci, “Pragmatism and Prejudice”, p. 783.

③ John Efron, Matthias Lehmann and Steven Weitzman, *The Jews: A History*, p. 352.

义作祟,反犹事件仍偶有发生。如何推动族际融合、构建包容社会依然是摆在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Abstract** The Pale of Settlement is a specific area where Jews lived i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of Russia from the end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It was a synthesis of Catherine II's immigration policy, frontier policy and Jewish polic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Russia participated in the partition of Poland for three tim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Polish-Lithuanian Jews followed the colony into Russia.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new colonie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pursued a tolerant policy of integrating Jews. However, due to the resistance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ethnic Russian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began to prohibit Jewish communities from entering the hinterland, and gradually confined them to the border provinces after 1791, hence forming the Pale of Settlement.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internal reforms carried out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made Jews encounter certain restric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raditional occupations, taxation, Jewish justice and other fields, and become more marginalized in social status. The appearance of the Pale of Settlement highlighted the estrangement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ain society as well as between the frontier and the hinterland in Russia. After the 19<sup>th</sup> century,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boundaries, the Pale of Settlement further block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Jews and the mainstream society, resulting in the historical dilemma of "Jewish problem" in late Tsarist Russia.

(疏会玲, 讲师,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厦门, 361021)

[责任编辑:于红]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增补卷

王希恩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 3 月 726 千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按时间顺序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作了辑录,有全文也有节选,力图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增补卷》是在201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全五册)》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献的增补,辑录了全五卷之外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进一步增强了文选的权威性、全面性和准确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全五册)》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增补卷》都是中国理论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必读书目,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